

隋代碑志百品

隋代碑志编选组编

新时代出版社

J292.24
84

隋代碑志百品

隋代碑志编选组编

新时代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代碑志百品/隋代碑志编选组编. — 北京: 新时代出版社, 2002.6

ISBN 7-5042-0689-X

I. 隋… II. 隋… III. 碑文—中国—隋代
IV. 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1399号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34 1/4 879千字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隋代碑志编选组成员

张振栋 常 明 张菊英 顾 昕 江 左

蒋 洋 赵胜利 钱 敏 蒋文光 李 军

张 斌 黄俊生 蔡 超

前言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隋代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但它是数百年南北分裂后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发挥了承上启下、融会贯通的巨大作用，故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泯灭。隋王朝只存在了37年，但在书法史上却是极重要的时期之一。

隋朝统一之前，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南朝文化与北朝文化有着一定的差异，南北地区的书法，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只有认识到南北朝书法的不同风格，才能使人们理解隋代书法融合南北朝书法的成就。此前，尽管不能说南北书法没有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极其有限的。隋朝建立，为南北地区的书艺的融合提供了成熟的条件，有力地促进了隋代书法融合南北书法于一炉的历史进程。造成这个新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隋代的统一，是经历了300余年长期分裂后的统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书法史上，南北书风的融合，又是以“趋向规范化”的表现而展开的。对隋代书法极其鲜明地表现出的这一书法发展的总趋势，前人多有言及。如杨守敬《学书述言》：“隋代混一南北，其书法亦有整齐之象。”欧阳辅《集古求真》：“按有隋混合南北为一统，而书法亦浑化南北，而兼有其胜。”由此可知，国家的统一，为南北长期分割所形成地区不同的书法风格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隋文帝登基后，其重文治，优礼学者，曾“诏购求遗书于天下”（《隋书》卷一《高祖上》）。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派遣使者到各地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如书家智永得到隋炀帝的重视，隋炀帝曾对智永说：“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见张怀瓘《书断》）对王羲之书派的赞扬，就会促使北方书家对它的重视，从而促进南北书法艺术的交流融合，使隋朝的书法具有南北朝书法兼收并蓄的特点。《唐六典》载：“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的设置，也有效地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隋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当代沙孟海先生指出：“隋代只有短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变革发展诡奇多变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面。这一过渡时期，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值得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和书风来考察，隋代的书法艺术是应值得重视的。

由于隋代仅仅37年，因此其时书法风貌，未能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太大影响。隋碑在清末前并不著称，自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专列“取隋”一章，大声疾呼要注重隋碑，书坛才开始青睐隋代碑刻书法。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尤其重视隋代碑刻书法，他认为隋代书法为古今书学一大关键，并“欲辑隋石记，以明书法流别”。再加上近百年来陆续出土为数较多的隋代志石，近人杨守敬、于右任、张玮等有识之士的爱好和重视，并广泛搜集，才使隋碑志显扬于世，为世人所瞩目。

纸寿不过千年,所以隋的经籍及文书之类甚少见存。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隋代书迹,绝大多数是铭石之书,且以楷书为主。因此,分析隋代书法只能以楷书为主。我国古代楷书,就时间和风貌而言,大致可分为魏碑和唐碑两大体系。介于两者之间的,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则要数隋碑了。隋代碑志以楷书为主,沙孟海先生从字体结构上作出分类,阐述隋代真书承上启下的来龙去脉,隋碑志的结体大抵分作“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前者出自北魏、东晋,后者源于北周、北齐。风貌上主要有四种:“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魏出来,以《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出来,以《曹子建庙碑》为代表,下开颜真卿。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碑》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薛稷、薛曜)。”沙孟海先生认为前两种属“斜画紧结”型,启欧阳询、虞世南之格局;后两种属于“平画宽结”型,认为“承前启后,迹象显明”,开褚遂良、颜真卿之门路。可见隋碑既保留了北朝雄放粗犷的风格,也吸收了南方俊秀柔丽之气,成就了文质两兼、刚柔相济的书风。“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迥,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会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取隋》)同时,隋碑下开唐风,欧、虞诸人皆由隋入唐,颇受时风薰染,在隋碑的基础上开创出唐楷的新面目,故其承前启后,中枢所在,功不可没,这也是书史研究者所屡屡提及的。

隋朝立国虽短,但传世的书法作品尚可观,其中以碑刻墓志为大宗。隋碑刻包括碑碣、墓志、造像题记、塔铭和刻经。本书所选主要有碑碣、墓志(包括砖志)、造像记和塔铭,这里结合实物作一简要论述。

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是隋代书法中最重要的遗存。清叶昌炽《语石》中评述隋碑说:“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盖承险怪之后,渐入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古法未亡,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徐、李、颜、柳诸家精诣,无不有之,此诚古今书学一大关键也。”这就是说,隋代的碑书仍处在由隶而楷的过渡中,然已渐去“隶贵精而密”的险劲特点,更多的是整齐平正的楷书体势,并下开唐楷先声。诸多隋朝的碑刻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首推《龙藏寺碑》,它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一碑,是隋代最卓越的著名碑刻。此碑最明显特色是:荟萃六朝,下开唐风;安静浑穆,风度端凝;既平正冲和,又婉丽迥媚。碑的书体方整,字画挺劲有力,看起来有些瘦硬,但有血有肉,用笔举重若轻,具六朝风度,极有韵味。《龙藏寺碑》倘与六朝诸碑相较,又显得十分“瘦劲”。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初唐楷法用笔“瘦硬”而备尽法度的艺术特点,确实与此碑的用笔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从结体来看,较之六朝楷书如《张猛龙碑》、《张玄墓志》、《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的朴质野逸,此碑也要平正端凝、宽博、婉丽、成熟得多了。该碑首录于宋欧阳修《集古录》一书,欧氏评其“字画遒劲,有欧、虞之法”。故从此碑字的用笔、结体可窥见唐代欧、虞、褚书法之发源,这说明隋代书法已孕育着初唐书法胚胎。故此碑在南北朝至唐的书法发展中,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曹子建庙碑》,又称《曹植庙碑》,碑主曹植,字子建,魏太祖武皇帝曹操之子,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正书,参杂篆隶,错综变化,浑为一体。书

法遒劲而丰腴。杨守敬《平碑记》谓“褚河南（褚遂良）胎息于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誉此碑为“快刀斫阵，雄快峻劲”，为诸隋碑之最。《启法寺碑》，周彪撰文，丁道护书丹。丁道护为隋著名书法家。明丰坊《书诀》列记钟、王以来善书者，隋四人，丁道护名在其三。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侔类。此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蔡襄又评其曰：“此书兼后魏造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此碑原石已佚，传世宋拓本仅临川李宗瀚所藏铃有贾似道“魏国公印”，并有陆恭、何倬、翁方纲、李宗瀚等人题记。《孟显达碑》，碑主孟显达，字令遵，武威人。原碑在唐代被用于刻成韦驮石椁，因此碑阴刻成屋顶形，可见此碑早被埋在地下。出土初拓本字尚清晰，今字迹多磨灭不清。正书，间作隶笔，书法端庄、秀丽，具有北朝书法的气息，又有南朝的风韵。近人方若《校碑随笔》谓：“书法修整，开虞、褚先声，较《龙藏寺碑》尤谨严。”

隋朝碑刻除楷书外，还有不少隶书碑刻。当时楷书虽已流行，但为显示庄严郑重，书碑者往往取隶书之淳古庄重的特点书碑。隋代主要隶书碑刻有《陈叔毅修孔庙碑》，碑主陈叔毅，记载修葺孔子庙的经过。此碑虽为隋隶，去汉较远，有曹魏隶意，仍具古朴风格。点画紧凑严整，使整个字的结构十分匀整，在技术上可以说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只是有些拘谨，稍显方正板刻，失去活泼和洒脱之风韵，但仍不愧为一件有价值的作品。《集古求真》谓“似楷似隶，饶有意致，亦当时之能书者”。《太平寺碑》，开皇九年（589年）立石，或作元年者，误。隶书，书法方广挺劲，隶书体态宽厚，用笔方棱截齐，气势颇为雄壮。欧阳修《集古跋尾》，谓“此碑在隋，尤为文字浅陋者，疑其里巷庸人所为，然视其字画，又非常俗所能”。《正解寺碑》，开皇十六年（596年）四月立，在河北定县开元寺，道光十八年移入崇因寺。隶书，书法精整遒丽。碑阴有“寺僧洪升等造佛像记”。又有《青州默曹残碑》隶法，杂见篆字。书法古逸险健，奇正相生，为隋碑别具一格者。

总之，隋碑刻楷书虽已流行，且为主流，但隶书碑志亦为数不少。其主要原因是，作书刻碑者，往往以隶书显其庄严尊重。故隋代的隶书，总体来说，体态宽厚，结构大多方整，用笔略嫌拘谨，似缺乏自然洒脱韵味。有些碑志隶楷兼及，形成非隶非楷的书体，这是隋代书风的一大特色。

与隋代碑刻相比，隋代墓志的风格也是丰富多彩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在开皇、仁寿间以隶书为常见，大业以来楷书渐占多数。据不完全统计，隋代的墓志有200种以上。尤其是近百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陆续出土了一批批珍贵的隋墓志，为我国的书法艺术宝库充实了新鲜的血液。隋墓志书法极其丰富多彩。仅从书法角度来说，大致可分为端整类、秀美类、峻整类、隽雅类、宽博类及瘦劲类等。隋墓志较著名的有《董美人墓志》，书法秀丽隽美，刚柔相济，体态端庄，为隋墓志中上品。志石出土时，几乎毫无剥落，如新刻般完好清晰。沙孟海先生以为是“峻严方饬一格，从北魏出来”，是说志书继承魏碑书法风格，与《龙藏寺碑》比较，为隋代书法中的又一种典型。志书虽书字体势趋方扁峻严，但笔画又具圆浑温润之致，不尽是“方饬”笔法。康有为以为近乎魏碑中的《刁遵墓志》，因为《刁遵》“为虚和圆静之宗”。《董美人墓志》虽在书法体态上较《龙藏寺碑》更多地带有隶楷的旧法，但在“虚和圆静”处，又体现了南北书风的融合，并下开欧阳询、欧阳通父子书风。近人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说《董美人墓志》“字迹隐秀端丽，与《元

公》、《姬氏》二志同为传世关中隋志翘楚”。《张通妻陶贵墓志》，原石已佚，流传多为翻刻。本书中收录者为原石拓本，甚为珍贵。正书，多六朝别字。书法清劲端丽，结体方整，笔画遒劲。字画肥润，神采奕奕者为原石拓本，若呆板无神者为翻刻本。清叶昌炽评为“遒劲婉约，锋颖如生”，这一评述十分中肯、公允。《龙山公墓志》，此志与一般墓志不同，圆首方趺，一如碑式。正书，书法朴茂沉雄，有魏钟繇遗风。清杨守敬《平碑记》也说：“原跋谓从钟太傅出，可谓精鉴。太傅诸帖，佳刻罕传。玩此碑点画结构之妙，思过半矣。”《苏慈墓志》，又称《苏孝慈墓志》，书法方整秀丽，而气骨峻峭，亦是隋志中之上品。此志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是伪作，其实只因为当时隋墓志出土不多，致有异议。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康氏对此志持贬词。而清毛枝凤《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认为“此志楷精健绝伦，实为佳刻。盖隋人楷书，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其沉着痛快处，有唐人所不能到者，欧阳公《集古录》每跋隋碑，叹赏不置，良有以也”。据此志的书法艺术造诣来看，毛氏评述较为恰当。《尉富娘墓志》，墓主尉富娘，河南洛阳人。正书，原石久佚，流传多翻刻本，此集辑录者为原刻本。笔画刚健丰满，结构方整，亦是隋墓志上品。杨守敬《丁戌金石跋》以为“书法峭健，上嗣丁道护，下开欧阳率更，实出《元公》、《姬氏》志上，在今所出古墓志，无与匹者”。近人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曰：“此志楷书道丽方整，与《董美人》、《元公》、《姬氏》三志齐名，收北碑之煞尾，开欧、柳之先河”。《元智墓志》，正书，多六朝别字。书法上承六朝之劲拔，下开初唐之秀整，秀朗遒劲，为隋代书法精品。历来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亦以为“书法劲秀，刻画峻拔，乃石刻中之妙品”。张廷济《清仪阁题跋》誉之更甚，其曰：“文词典则，书格精整，古志石中绝无仅有之作。”《元公妻姬氏墓志》，书法精整端丽，与《元智墓志》有双璧之称。两志相比，是志虽少疏朗之气，然亦饶古意，或以为同一人所书。清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太仆志》极沉毅，《夫人志》稍加妍秀”。陆耀遹《金石续跋》说：“文辞雅驯，书法严杰，北宗也。而结体审正，一洗南北朝之纤习，世重欧、虞书，此为先后矣。”

墓志中还有较多宫人墓志，1925年相继出土于洛阳城西后洞村西北寇姓田中，主要是隋大业年间的宫人墓志，共出土29通。主要有大业十年书刻的《宫人陈花树墓志》、大业八年书刻的《宫人阿氏墓志》、大业六年书刻的《宫人朱氏墓志》等。这些宫人墓志出土的所在地，乃是东都宫人丛葬之所。读其文可参见隋时宫掖女官之制，且知东都宫中医制，亦与长安相等。

墓志盖是墓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墓志（包括隋代墓志），往往仅存志身，佚失志盖，可能与以往金石收藏者仅仅注重志文有关。但志身和盖齐全的墓志也为数不少，隋代墓志也不例外。志盖上面，往往刻有精美的花纹，身份地位越高的死者，往往志盖上的纹饰也越发精致、繁缛。如隋开皇二十年所刻的《独孤罗志并盖》，志侧刻十二辰，盖侧刻有四神及窃曲纹。又《马稚及妻张氏墓志并盖》，四周刻八卦符号，斜刻天干地支。但亦有不少志盖为素面，仅有铭文题盖。其铭文有正书阳文，但以篆书阳文居多。从志盖的纹饰和盖铭字体可以基本上分辨出它们的制作时代。

综观以上所说，隋朝有一定数量的墓志，从隋墓志中可以窥见隋代书法发展的趋势，同样从隋墓志中亦可窥见隋代是楷书发展的关键时代。这些墓志是重要的考古资料，还有着

很高的史料价值与书法价值。除有明确的纪年可资断代外，其中还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字资料。通过这些墓志的志文和纹饰，可以了解当时的各种历史文化状况。墓志的文字形体多变，有着各种书体，成为古代语言文字和书体嬗变的重要资料。同时，这些志文出自著名的文人之手，文辞华美，感情真挚，在文学史上也占重要的地位。又由于隋代墓志较为盛行，在书法、文体、雕饰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同时，这些官人志和墓志，除了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外，还可用于校史、补史之阙，即有些史书、传记记载简略，甚至只字未及，却均赖志知之，故为广大学者和有识之士所青睐。隋代传世墓志主要由陕西博物馆、河南洛阳石刻艺术馆、新安千唐志斋、开封博物馆等地收藏。解放以来新出土的石刻以墓志为主，出土地以陕西西安附近及河南、江苏等地为主。这些墓志的出土，都为所在墓葬提供了可靠的纪年，从而为隋墓形制及随葬品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

隋代佛教石刻新出现了一种埋设在塔基中的舍利塔下铭。它源于隋文帝命令全国30州同时建舍利塔之举，其内容、形制都大同小异。传世品有仁寿元年的青州、同州、京兆等地的舍利塔下铭，及近世出土的耀县宜州神德寺舍利塔下铭。塔铭在隋代碑刻中占有一定数量，亦引世人瞩目。根据出土情况及石刻铭文自身注明的名义，隋代属于塔内的石刻有塔铭、石函、浮图（刻铭石塔）等。塔铭，主要指葬塔上嵌置或放在塔内的石刻铭文。《语石》卷四曰：“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之铭，犹世法之有墓志也。然不尽埋于土中，或建碑，或树幢。其纳诸圜者，或用横石，修一之，广倍之；或方，径不逾尺。”一般塔铭的形制与常见墓志略有不同。它往往只是一块横长竖短的石板，无盖，一般也不加图纹装饰。可是，塔铭的文体、内容及埋设目的均与世俗墓志相近，甚至有些塔铭自称为墓志。所以，一般都把它与墓志看作一类器物，收录于有关墓志的著作中。亦有的著录中，按它特有的形制和用途，而单独列为一类石刻的。这里将隋代塔铭略举数例介绍如下：

《青州舍利塔下铭》，又名《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隋仁寿元年（601年）十月十五日，为隋文帝青州逢山县城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立碑。隶书，12行，行12字。额题“舍利塔下之铭”正书6字。左右题名2列，列4行，原在山东益都广福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铭曾嵌于寺内东北屋北壁，额留大门内，后归端方，额失。此铭书体结构应为楷书，但部分笔画间用隶法，且间篆笔，这是北齐隶书的延续。此铭文书法结构较宽博，用笔厚重凝炼，遒劲而有古趣。总体来看，此铭非隶非楷、似隶似楷的书法饶有独特的趣味。《栖霞道场舍利塔碑》，全称《大隋河东郡首山栖霞道场舍利塔之碑》，窦庆立，贺德仁撰文，无著书姓氏，不记立碑年月，赵明诚《金石录》作“仁寿二年（602年）”。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作“大业三年（607年）”所立。碑额阳文篆书16字“大隋河东郡首山栖霞道场舍利塔之碑”。此碑为古代碑刻中著名的三只“鱼子碑”之一，尤以此碑鱼子石为最，全碑满是鱼子一样小点，但又不影响碑刻字形，很是特异。正书，其书风高浑，结体缜密，用笔劲健，为隋碑的代表作之一。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评曰：“碑字笔法缜密高浑。”此碑可谓煌煌巨制，全碑共约2400字，而残损之字很少，是学习隋代楷书的很好范本。石存山西永济县条山栖霞寺。《僧璨大士塔砖铭》，隋开皇十二年（592年）书制。1982年杭州市区出土，今藏浙江省博物馆。铭文阳文，楷书。砖侧有“大隋开皇十二年作”题记。砖铭正书，书法自然，似随意书写，其书法凝练内含自然天真之趣，惜经刻范、压制等工序，其用笔的变化已泯灭不清。

隋代造像题记，集中在河南洛阳龙门、河北邯郸响堂山、山东益都云门山、济南千佛山等主要石窟群，题名往往只有年月、姓名等简单的内容。有些造像题记字数也很可观。隋造像题记虽为数不少，但精粹者不多。从诸多的造像题记，尤其是一些小造像题记来看，其书法风格各异，有的仍具有北齐隶书遗风，有的在拙劲处，时见流利之笔，且变化有姿致，在隋代造像记中随处可见类似这种风格，特别是小造像题记尤为明显，这可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书风。同时，造像题记中还记录大量姓名、职官、籍贯以及祈福原因等内容，对研究当时的风尚、民族、官职、地理等社会情况都具有参考价值。尽管造像题记内容简略，但它们往往是刻石制作年代的可靠证据，对于刻石断代起着重要的作用。

隋代的刻经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云居寺。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带山山麓，山中凿有石室，储藏历代石刻佛经，故又称“石经山”。隋代刻经最著名、最出众的首推北京房山刻经。房山刻经始刻于隋朝，迄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云居寺石经均由长方形的石板刻成，刻成后即整齐排放在石洞或地穴内，装满一室即行封掩。虽历经千年以上，但基本上保存完好。这些石刻佛经是佛教经典的宝库，也是历代石刻的重要宝藏。石经的刻写方式基本分为横刻、竖刻（竖刻以隋唐时期居多）以及在额部加刻佛龕的仿造碑式三种。经文的书法都十分工整秀丽，纹饰精美。除佛经本身外，在经版上附刻有刻经题记。这些题记中有大量各个时代地名、人名、职官、商业、行会等方面的记录，是研究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石经开创于隋代幽州智泉寺僧静琬。静琬（？—639）为隋唐之际幽州沙门，从其发愿刻经到贞观十三年（639年）去世的30多年中，从未间断。所刻经典有《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金刚经》、《胜鬘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百余种。现在石经山雷音洞内嵌有静琬最初刻经版146件。石刻经版的编制方法是根据1989年在石经山雷音洞前石栏下出土的一方残碑铭文（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刻）内容进行的。经研究，铭文是静琬刻毕《涅槃经》后的题记。其中记载《涅槃经》共刻80石，分为6个组，按1、2、3、4、5、6组顺序排列，每组刻石数分别为17、20、18、11、12、3石。在房山全部石经中，采取分组并于正反面刻经的，只有静琬的石刻《涅槃经》。静琬所刻这些佛经碑石，保存了隋至初唐大量的书法瑰宝。这些刻经在文字方面，石经中颇多简体字和别体字，如“無”作“无”、“尔”作“尔”、“來”作“来”、“號”作“号”、“輿”作“舆”、“網”作“网”、“圍”作“围”、“莊”作“庄”、“得”作“得”等，有数十字。这和当今所用的简化汉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见汉字简化早有传统。

总之，隋代的书法，正处在“参杂多体，综合变化，奇正相生”的激烈变革的时期，也是兼容并包，使我国真楷、行草纳入统一轨道的新时代。它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融合贯通南北书风的过程中。此外，隋代书法又在融合南北书风，在融铸旧体，创造新体的过程中，表现出多种艺术风貌、特点和风格，直接下启初唐书法，即在隋碑的基础上开创了唐楷的新面目。这充分体现了隋代书法作为承前启后的枢纽的价值所在，这样的价值是不可混灭的。

目 录

杨通墓志	1	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碑	172
姜敬亲墓志并盖	3	苏孝慈墓志	183
李惠猛杨静太造像记	16	王荣及妻刘氏墓志	213
桥绍墓志	17	马少敏墓志并盖	214
何祥造像记	24	花成寺舍利塔记	215
龙藏寺碑	25	符盛及妻胡氏墓志	216
杨畅墓志并盖	36	马稚夫人张姜墓志并盖	217
殷洪纂等造像记	38	李渊造像记	219
崔长晖墓志并盖	39	李渊为子析疾疏	220
郑夫人令妃墓志并盖	42	刘尚食墓志并盖	221
暴永墓志并盖	52	蔡君妻张贵男墓志	228
僧璨大士塔砖铭	58	刘渊墓志	243
李钦及妻张氏墓志	59	郭云铭	244
诸葛子恒平陈颂	66	任轨墓志	245
罗宝奴造像记	72	杨德墓志并盖	247
曹子建庙碑	73	李静训墓志并盖	249
静证法师塔记并阴	87	郭世昌墓志	254
李钟葵妻马怜造像记	88	宫人李典玺墓志并序盖	255
张通妻陶贵墓志	89	宫人(司乐)刘氏墓志	262
董美人墓志	96	张乔墓志	269
刘多墓志并盖	105	宫人五品程氏墓志铭	270
孟显达碑	107	董穆墓志	280
龙山公墓志	138	宫人司饔六品贾氏墓志	281
卢文机墓志铭并盖	148	梁瑰墓志	289
古宝轮禅院记	156	宫人典彩六品朱氏墓志	299
大兴县龙池寺舍利塔记	157	宫人司仗六品郭氏墓志	305
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	158	斛斯枢墓志砖铭	310
邓州舍利塔下铭	160	王香仁墓志并盖	311
郭休墓志	161	宫人尚寝衣魏氏墓志	312
启法寺碑	163	宫人何氏六品墓志铭并序	319

孟孝敏妻刘氏墓志	326	宫人姜氏墓志	408
宫人无锡七品陈氏墓志	329	白仵贵墓志	416
宫人萧氏墓志铭并序	335	明云腾墓志并盖	419
裴逸墓志	343	严元贵墓志并盖	432
田光山夫人李氏墓志并盖	345	张波墓志	440
成公夫人墓志	346	萧滨墓志	441
张伏敬墓志	347	尉富娘墓志	442
宫人陈芬芳墓志	348	宫人采女田氏墓志铭并序	448
张业及妻路氏墓志并盖	355	元公夫人姬氏墓志	454
张盈墓志	362	元智墓志	464
豆卢氏墓志	363	宫人司饽丁氏墓志并序	480
尼那提墓志	365	宫人刘氏墓志铭	486
张虔墓志	367	唐直墓志	491
萧瑾墓志	368	宫人徐氏墓志	492
宫人元氏墓志	369	王世琛墓志并盖	493
王夫人光墓志	375	苏威妻宇文氏墓志	502
牛晖墓志	376	宫人房氏墓志铭并序	506
采女田氏墓志	379	唐世荣墓志并盖	510
宫人陈花树墓志铭	385	宋永贵墓志	511
张轲墓志并盖	391	宫人唐氏墓志铭并序	523
宫人唐氏墓志铭	401	宫人六品墓志铭并序	528
宫人尚食侯氏墓志	407	宫人司计划氏墓志	532

隋故盧陵太守楊府君墓誌銘
君諱通字達之青州益陽人也其先本
林時楊子簡有成聖之功隨錫櫜氏爲紫
愷丹車之貴豪湖五郡行濟民望之出揚
名於中夢祖諱東漢勅使羽騎尉父
諱鎬起鎮北平府參軍漢北太守建威特
軍君仕盧陵太守虎賁中郎將咸武將
軍沙漢駝譽開皇元年二月三日遘卒卜
開皇二年四月六日葬於淄川城東八里
凡再士友至於賓僚銘石題徽武楊景烈
乃作銘曰
月鏡與升漢高星朗綿綿壽總曩吳勢
行歸於隋萬民所望赫赫新途繼繼英
六龍登号三虎馳名并谷有輝斯名以諡

楊通墓志

隋開皇二年(582年)四月六日葬于
山東淄博。志石縱43厘米，橫41厘米。
志文正書，14行，滿行17字。出土地點
未詳，待考。

名於中夢祖諱東漢勅
諱鎬起鎮北平府參軍漢
軍君仕廬陵太守虎賁
軍沙漠馳譽開皇元年二
開皇二年四月六日墓於
凡厥士友至於賓僚鐫石

姜敬亲墓志并
盖

隋开皇三年
(583年)十月十
九日。志石纵
48.9厘米,横49
厘米。盖底边长
49厘米,宽49.3
厘米。盖顶篆文
“故襄城府君冠
公夫人姜氏铭”
12字,阳文。此
剪裱本每半开
23.2厘米×13.6
厘米。1925年河
南洛阳出土,曾
归于右任,鸳鸯
七志斋藏石。





